



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学者风采 > 作品选录

由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谈史家据本人文章改写本传

【作者】伏俊琰

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中有几个完整的段落，如戏弄侏儒一段，射覆一段，与郭舍人争辩一段，与本传所引东方朔自己的《上书求仕》、《答客难》在风格上很相近，都以调笑诙谐为其特色。

如东方朔与郭舍人在汉武帝面前因为射覆而相互调笑的一段，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对问体调侃俗赋：

时有幸倡郭舍人，滑稽不穷，常侍左右，曰：“朔狂，幸中耳，非至数也。臣愿令朔复射，朔中之，臣榜百，不能中，臣赐帛。”乃覆树上寄生，令朔射之。朔曰：“是寔藪也。”舍人曰：“果知朔不能中也。”朔曰：“生肉为脰，乾肉为脯；著树为寄生，盆下为寔藪。”上令倡监榜舍人，舍人不胜痛，呼晷。朔笑之曰：“咄！口无毛，声警警，尻益高。”舍人恚曰：“朔擅诋欺天子从官，当弃市。”上问朔：“何故诋之？”对曰：“臣非敢诋之，乃与为隐耳。”上曰：“隐云何？”朔曰：“夫口无毛者，狗窦也；声警警者，鸟哺馥也；尻益高者，鹤俯啄也。”舍人不服，因曰：“臣愿复问朔隐语，不知，亦当榜。”即妄为谐语曰：“令壶龠，老柏途，伊优亚，狌吽牙，何谓也？”朔曰：“令者，命也。壶者，所以盛也。龠者，齿不正也。老者，人所敬也。柏者，鬼之廷也。途者，渐洳径也。伊优亚者，辞未定也。狌吽牙者，两犬争也。”舍人所问，朔应声辄对，变诈锋出，莫能穷者，左右大惊。（《汉书》中华书局标点本2844页）

日本学者清水茂认为：“这件事，《汉书》当然认为事实，但是如果东方朔和郭舍人预先秘密地通情合作的话，可以说是一幕喜剧。演员有两个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丑，互相问答，双方的对白都押韵，认为原始的戏剧。那么东方朔的‘赋的变种’《答客难》，别人扮客问他也可以。”[1]清水氏的说法是富有启发性的。

东方朔其人，《汉书》本传即说他是“滑稽之雄”，“其事浮浅，行于众庶，童儿牧竖莫不眩耀，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。”班氏又称刘向言：“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，皆曰：朔口谐辩，不能持论，喜为庸人诵说，故令后世多传闻者。”扬雄《法言·渊骞篇》也说“世称东方生之盛也，言不纯师，行不纯表，其流风遗书，蔑如也”，“非夷尚荣，首阳为拙，柱下为工，饱食安坐，以仕易农，依隐玩世，诡时不逢”。所以，当时东方朔本人的滑稽诙谐的“韵诵体”文章和以东方朔为主或客的“诵说”体文章肯定很多。据逯钦立考证，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主要是根据《东方朔别传》改写而成[2]；而《东方朔别传》则是西汉武帝后期至元、成之际的人根据东方朔本人或他人以东方朔为主创作的滑稽诙谐的“韵诵体”改编而成。因而，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中相对独立的那些段落，都是东方朔本人所作或以东方朔为主人的滑稽诙谐的“韵诵体”杂赋。

刘知几《史通·杂说上》：“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委琐烦碎，不类诸篇。且不述其亡歿岁时及子孙继嗣，正与《司马相如传》、《司马迁》、《扬雄传》相类。寻其传体，必曼倩之自叙也。但班氏脱略，故世莫之知。”按子玄之说，史籍无考，《汉书叙传》也没有说明。但他

收藏文章

打印文章

关闭本页

发表评论

阅读量[1413]

评论数[0]

已经看出本传是根据东方朔自己的作品写成，却是极有眼光的。不过，与其说是必曼倩之自叙，不如说是依据东方朔自己的文章联缀改编而成。《艺文类聚》卷23录有东方朔的《诫子》，其实是一首诗，所以沈德潜《古诗源》遂名为《诫子诗》。而《汉书·东方朔传赞》就是取《诫子诗》中的六句而成。可见班氏作朔传，是大量利用了东方朔自己的作品的。欧天发先生说：“朔给侏儒，及对上下问一段；射覆于下守宫之辞；又以时天下侈靡趋末，朔戒帝淫侈‘对曰’一段，皆韵语及整齐句法。凡此盖本东方朔所遗之篇什，叙述而为传文者。然则史传中隐括传主之篇什以入传，虽传中不明显言之，亦得视为本属独立之一篇。”[3]

史家据传主本人的文章改写传记，可以说是史家之通例。

《屈原列传》叙述屈原至于江滨，与渔父对答一段，就是根据屈原自己的《渔父》改编而成。如果《楚辞·渔父》一篇不传于世，我们就不会知道这是一篇独立的文章。

《文选》卷45载有宋玉《对楚王问》，按此篇最早见于《新序·杂事一》，与《文选》所载文字上略有差异，如“《阳陵》《采薇》”《文选》作“《阳阿》《薤露》”，“粪田之鵒”《文选》作“蕃篱之鵒”。这些差异一则说明《文选》并不是据《新序》转载的，《汉书》诗赋略著录“宋玉赋十六篇”，《文选》当是据单篇流传的宋玉赋载录的。二则说明刘向《新序》的这段历史记载确实是根据宋玉自己的赋改编的。我们对第二点陈述点理由。《新序》作“《阳陵》《采薇》”较《文选》作“《阳阿》《薤露》”为是。《艺文类聚》卷43、《太平御览》卷572引《襄阳耆旧传》作“《阳阿》《采薇》”，《古文苑》宋玉《舞赋》有“阳阿”，《楚辞·招魂》有“采菱”，《淮南子·人间》有“阳阿采菱”。陵，山头；阿，山曲；其义相关。故《阳阿》亦《阳陵》类也。薇、菱皆为可食之菜，且《采薇》为《诗经》篇名。而《薤露》为古挽歌名，晋崔豹《古今注·音乐》：“薤露、蒿里，并丧歌也。出田横门人，横自杀，门人伤之，为之悲歌。”可证《薤露》汉初才有，宋玉不得引用之。赵逵夫师认为《新序》所载先秦史料的历史价值，有些比《战国策》更接近原始实际情况（《庄辛谏楚襄王考校兼论新序的史料价值》，收入《屈原与他的时代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），《新序》所载《对楚王问》与《文选》的差异，也可说明这一点。

晋习凿齿《襄阳耆旧传》（《太平御览》卷399引）的《宋玉传》中，今存者有《宋玉因其友见于楚襄王》、《对楚王问》、《宋玉赋高唐之事》等故事。第一则见于《新序·杂事五》；第二则见于《新序·杂事一》和《文选》；第三则即《文选·高唐赋》的开头部分，也见于《文选》江淹《拟潘岳述哀诗》李善注引《宋玉集》。第二则、第三则已证明是宋玉单篇流传的辞赋，那么第一则也可能是宋玉自己的作品。习凿齿据流传的《宋玉集》改编《宋玉传》，采用的正是太史公、班固的方式。

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有顷襄王十八年，“楚人以弋说襄王”一段，姚鼐《古文辞类纂》收入辞赋类，认为本是单篇文章，太史公错误地作为史实收入《史记》（姚鼐《古文辞类纂序》：“余尝谓，《渔父》及《楚人以弋说襄王》、宋玉《对楚王问遗行》，皆设辞，无事实，皆辞赋类耳。太史公、刘子政不辨，而以事载之，非是。”）是则《楚人以弋说襄王》也本是单篇文章，而史家据此以作传。

《韩非子·喻老篇》载有右司马以隐谏楚庄王一段：

楚庄王莅政三年，无令发，无政为也。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曰：“有鸟止南方之阜，三年不翅不鸣，默然无声，此为何名？”王曰：“三年不翅，将以长羽翼。不飞不鸣，将以观民则。虽无飞，飞必冲天。虽无鸣，鸣必惊人。子释之，不谷知之矣。”处半年，乃自听政，所废者十，所起者九，诛大臣五，举处士六，而邦大治。

这段故事，也见于《吕氏春秋·重言篇》，为成公贾谏荆庄王；也见于《史记·楚世家》，为伍举谏楚庄王；也见于《新序·杂事二》，为士庆谏楚庄王；还见于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，不过变成了淳于髡说齐威王的事。这充分说明，这本是一篇单独流传的文章，不韦以为成公贾作，史迁以为伍举作，而子政以为士庆作，各据传闻，故有这样大的差别。

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褚少孙所补六章中有记东方朔“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议论”一段。按此段即《汉书·扬雄传》所录雄自著之《答客难》。如果不是《汉书》把它记载了下来，我们便不会

知道这原来是褚少孙根据扬雄的自著改写的。

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《扬雄传》抄写他们两人的《自序》，也是明显的。梁人编辑汉人的文集，率自别传删取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大概史家据本人作品以作传记，其法有二：第一是径载其词，而在前后明其原委，著其始末，使读者知道事情的完整过程。严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例》曰：“唐以前旧集，体例不与今同。如扬雄《上书谏勿许单于朝》，《御览》八百十一引雄集曰：‘单于上书愿朝，哀帝以问公卿，公卿以虚费府帑，可且勿许。单于使辞去未发，雄上书谏’云云，所以识其缘起也。末又引雄集曰：‘天子召还匈奴使者，复报单于书而许之，赐雄黄金十斤。’所以竟其事也。诸书旧集，此类甚多。”按：严氏以为《扬雄集》本如此，其实严氏刚好说颠倒了。《扬雄集》最早见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，不知何人所编。张震泽《扬雄集校注前言》根据王逸集《楚辞》而不收扬雄辞赋，判定“最大的可能是那时已有《扬雄集》通行”。而《扬雄集》的编辑，主要依据史书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曰：“《扬子云集》五卷，汉黄门侍郎扬雄子云撰，大抵皆录《汉书》及《古文苑》所载。”《上书谏勿许单于朝》即据《汉书》而来，严可均所引《太平御览》引用的讲《上书谏勿许单于朝》前因后果的那些话，统统见于《汉书·匈奴传》。

我再举一个例子，《韩非子·存韩篇》，其中收有李斯《上秦王驳议韩非书》、《上韩王书》两篇，所以论者根据这条便断定“此可决其必非韩子之文者”（陈千钧《韩非子新传》，见诸子集成本《韩非子集释》附录）。陈奇猷先生则谓：“盖编《韩非子》一书者连类记录，后人未加审择，遂以本篇为伪作。其实《存韩》正文出于韩非，可以此为佐证。至于李斯《上韩王书》，乃以李斯《上秦王书》连类而及。”其实附录李斯《上秦王驳议韩非书》，是为了说明韩非上书的后果。

根据本人作品作传的第二种作法是：直接改编原文，使与前后叙述浑然一体。这种方法，往往混淆假托之辞与史实的界限，所以遭到一些史学家的严厉批语。刘知几《史通·杂说下》云：“自战国以下，词人属文，皆伪立客主，假相酬答。至于屈原《离骚辞》，称遇渔父于江渚；宋玉《高唐赋》，云梦神女于阳台。夫言并文章，句结音韵，以兹叙事，足验凭虚。而司马迁、习凿齿之徒，皆采为逸事，编诸史籍，疑误后学，不其甚耶？”又曰：“嵇康撰《高士传》，取《庄子》、《楚辞》二渔父事，合成一篇。夫以园吏之寓言，骚人之假说，而定为实录，斯已谬矣；况此二渔父者，较年则前后别时，论地则南北殊壤，而辄并之为一，岂非惑哉？”又曰：“庄周著书，以寓言为主，嵇康述《高士传》，多引其虚辞。至若神有混沌，编诸首录，苟以此为实，则其流甚多。”

[1] 清水茂《辞赋与戏剧》，《辞赋文学论集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。

[2][2] 逯钦立《汉诗别录》，《汉魏六朝文学论集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。今为逯氏再补充一条证据：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附褚少孙补充的六件事情中就有东方朔的记载，与史传互有同异；褚氏自言为郎时，“好读外家传语”，外家传语，即别传之流。那么《东方朔别传》，褚少孙已经看到了。

[3] 欧天发《赋与说唱文学之关系》，台湾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1995年主办“国科会中文学门专题研究计划成果发表研讨会”论文第33页。

【原载】《西北成人教育学报》2001年4期
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	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	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科渊源	江西师大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语言文学系，是省内同类院系中历史最久、实力最强的院系之	介绍
有自，基础厚实，发展强劲，特色鲜明。前有梁宗岱、王宗		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建于1956年，已有50余年办学历史。现任院长谢建忠

更多
加盟
信息

